

# 横亘在城乡之间的那个「我」

□ 饶翔



近年借由微博微信等平台每年都会在春节期间火上一阵的“返乡笔记”，在2016年终于发酵成一个大事件。猴年春节期间，“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霸气媳妇回农村掀翻桌子”等文章流传广泛，媒体和网民热议。这些吸引网友眼球的文章后来证明纯属杜撰，有关方面也及时做出了澄清。而分别在2015年春节和2016年春节刷爆朋友圈，并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讨论的两篇“返乡笔记”《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和《一位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由于书写者身份的特殊，也由于文本的相对复杂，似乎留下了更多的讨论空间。

2015年春节，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以一个文科在读

博士返回湖北老家的所思所感，总结了农村的变化，从春运火车到传统人伦关系的瓦解，到“新的读书无用论”。在2016年春节流传的“返乡笔记”中，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此前在《十月》杂志发表时的篇名叫《回馈乡村，何以可能》，但从传播学的角度，这一知识分子气的标题显然不如《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利于传播）是引起了较大反响的一篇。这固然是由于“笔记体”的纪实性唤起了公众的好奇心，但其“文学性”的力量仍然是不应被忽视的。从文学修辞的角度考量，《回馈乡村，何以可能》是一个有“我”的故事——嫁给了“凤凰男”、不期然地卷入了大家悲惨境遇的这样一个农村儿媳的个人

经验故事。所以这篇文章动人的地方可能不在于它对于农村现实的描述，而在于它以一个“我”的故事，感染了读者，尤其是引发了有类似经历的读者的共鸣——在乡土仍然是中国最广泛的现实环境的情况下，大多数进了城、留了城的读书人身后依然千丝万缕地联系着“乡土中国”。对此类读书人来说，乡村是一处既想摆脱逃离，又被“道义”牵扯的所在；既想“回馈乡村”，又无力改变现实，是许许多多此类读书人的隐秘情结。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同时也可大胆地预测，“返乡笔记”的作者和读者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它们更多的是一种主体焦虑的投射：当他们饱含道义与深情地关心中国乡村的命运，却发现他们改变不了什么，甚至于，他们感到，知识也不再为乡村所需要。或者再换一种表述，这两篇笔记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他们呼应了一种横亘在城乡之间的知识阶层的普遍焦虑——既无法与工农结合，又无法与资本结合，在中产道路上受阻进而产生的焦虑。

两篇返乡笔记的作者不仅是博士，而还是文学博士，这一点也是值得分析的。一方面，拥有更强的叙事能力和抒情性，使他们的文本具有更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尽管是以“非虚构”的文体呈现，但它们显然无法与更为“客观全面”的农村问题研究成果相提并论，而是发挥文学修辞的力量，“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黄

灯以诚挚的笔调，坦露了她内心的纠结和痛苦。这种自我的真诚抒发，也构成了“非虚构”作品的文学性品格。更进一步说，进入21世纪，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的界限没有那么分明，我们最熟知的一种表述是历史也是一种（文学）叙事。而文学也需要很大的一个社会学的视野去深入到现实里面，不能靠简单的经验。比如前几年社会学者廉思带领团队所做的社会学调查《蚁族》，我们从中就能读到很多文学的笔墨。用“蚁族”这个词来形容生活聚集在唐家岭一带的外来北京务工的边缘大学生群体，这本身也像是一个文学的形象或修辞。我越来越觉得社会学和文学密不可分，而且不是简单地在一个文学写作的层面来说我们写作要有宏大、深入的社会学的视野，而是在一个社会学与文学已经越来越混淆、越来越面目不清、越来越合为一体的层面去讨论文学与社会学的问题。

两篇作者同为文学专业研究的身份背景，或许也使他们具有较多现代乡土文学的“无意识”，承袭了启蒙知识分子某种“归去来”式的书写模式和“情感结构”。为底层代言，是许多知识分子自觉背负的崇高使命，但是如黄灯这样“替”哥哥嫂嫂感知命运不公（或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现代性视角，在今天是不是应该有所反省？道义感、道德激情固然真挚感人，但是作为一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仅仅停留在个人的道德感是不够的；克服一己之私（也包括超越自己能力范围的“回馈”家庭之私），而追求社会与国家的公器与公道，是该有的格局与境界。

城乡之间的转型与变化，是广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有志作家的重要书写题材，如乔叶的“非虚构小说”《盖楼记》和《拆楼记》，聚焦农村非法用地、拆迁、赔偿等一系列的问题；在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们读到乡村青年进城的个人奋斗并最终失败的故事，感觉到当前的城乡和阶层的区隔。孟繁华有一篇文章把《涂自

强的个人悲伤》和路遥的《人生》联系在一起，他提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从高加林到涂自强，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青春的消逝。高加林的失败让我们感觉到他随时可以卷土重来，而涂自强的失败则让我们感到他毫无希望可言。而我恰恰关注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的青年、青年知识分子的自我问题。梁鸿在其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新版的后记里面特别思考到了：“我是谁？”乔叶的《盖楼记》和《拆楼记》中，“我”不光是一个观察者，而且是事件直接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我觉得其中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我”的位置。乔叶固然在小说里面有对农民的种种陋习——包括她的亲人，她姐姐、姐夫的——以至于来自于生理的嫌恶，但是乔叶设计的位置是并不比她的人物站得更高，她就是他们中的一份子，她也并不想掩饰她的精明、算计和强悍。乔叶的自我意识在她这部所谓“非虚构小说”的最后说得很清楚：“——很多事情，我曾经以为我知道。但是，现在，我必须得承认，我并不知道。而我曾经以为的那些知道，其实使得我反而远离了那种真正的知道。——此时，如果一定要确认一下我的知道，我只能说：我最知道的是，张庄事件之前的我，和之后的我，已不太一样。”

在黄灯的《回馈乡村，如何可能》中，我们也读到了这样一个纠结复杂的、横亘在“城乡之间”的那个“我”。那么，当我们看到整个当代文学所谓青春的消逝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的叙事人的主体萎缩退却了，还是因为他们更深入地或者更切实地认识到了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并且对于这样一个复杂性有一种想认识的愿望？而这个“我”是不是也是“想象中国的方法”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层面？进一步说，新的乡土文学书写，如何能既超越启蒙，又超越乡愁，让处于转型期的乡土获得尽可能多的自我呈现，或如项静所言，“如何想象和重建一种具有主体性的乡村生活，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新乡土文学发展的契机和方向”。

## 从张悦然《茧》看“80后”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

□ 徐刚

在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中，历史不再那么庞大而虚无缥缈，它变得确凿地“在场”，成为可以真切感知的痛苦。与张悦然的《茧》相似的是，在近年来的“80后”写作中，年轻的作者都曾表现出历史叙述的雄心，但也只能在个人风格化的写作中生硬地触及。

如人们所看到的，在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中，历史不再那么庞大而虚无缥缈，它变得确凿地“在场”，成为可以真切感知的痛苦。对于这部小说的历史转向所显示的写作意义，张悦然显然寄予厚望。在她看来，“80后”早慧而晚熟。“这一代人，很早就登上了舞台，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迟迟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图景，了解自己在时代和社会里的真实处境”，事实也证明，“青春文学的潮流过去以后，并没有留下太多真正有价值的文本。但是，‘晚熟’也总会成熟，迟一些出发也终将抵达。我感觉到这些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相信它不是偶然和特例。像我这样一个‘耽于幻想’的人，都能去面对现实和历史，可以想象，与我同代的那些优秀的写作者，一定对历史和现实有更深刻的思考和更独到的见解。”

张悦然的自省当然意义非凡，它意味着告别旧我，向新的写作可能的迈进。然而，她的谦虚也并非没有原因。或许正是因为自身写作历史感的匮乏，惟恐小说历史的厚度难以服众，张悦然为《茧》中的历史回望和清理设计了非常严密的逻辑。作为小说中历史迷雾里的骇人真相，钉子的故事其实来自张悦然父亲当年的小说，那个写于1977年的灰暗故事，当然无法逃脱当时已然流行的伤痕文学脉络。然而，这个嫁接过来的故事，如此轻易就进入到“我”的记忆之中，甚至构成了历史厚度的核心来源，这多少还是让人觉得过于轻巧。父亲一生的仓惶、倔强与颓废，既有对于爷爷的徒劳反抗，更有一种难言的政治失败的痛苦。这种历史回溯的人物设计如此巧妙，一下就网罗了主流文学最为热衷的两个历史节点，剩下的事情就变得简单起来。小说借此似乎获得了写作的非凡荣光，再也没有人敢对年轻一代的轻薄说三道四了。然而，这种隆重的意义毕竟是以历史强行植入的方式获得的。小说中的李佳栖通过各种方式，试图挤进父亲的历史，进而触摸祖辈的历史。她一生都在兜兜转转，无法破茧而出，这也是“80后”写作的历史宿命所在，他们没有自己的历史，而只能通过讲述父辈的历史，去触摸祖辈的历史，从而为自己的写作徒增一丝残存的荣光。然而即便如此，她也要试着迈出这一步，只做出一些改变。

因此，尽管小说所标榜的历史厚重令人怀疑，但在历史的缝隙之中，张悦然风格化的写作方式还是给人带来了长久的感动。正如她所言的，如果说《茧》可以视作一部成长小说，那么它也记录了作者本人的成长。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其历史的讲述之中，张悦然并没有丧失她原有的风格化的“腔调”，以及文字里最为动人的“生气”。换言之，这个故事总在既定的叙事之外溢出来的那一部分，这是作者在过往的小说中常常流露出的最为动情的成长叙事。那些

细腻的情感，难以磨灭的人与事，在历史的裹挟下铺展开来。而在此之中，那些玉女的忧伤，青春的独白，疼痛、颓废、病态与毁灭，乃至极端情绪的描摹都依然如故。这是她少女时代的笔锋，青春期写作的热情与细腻魔幻的词藻，以及温暖的意象流露的真情与爱意都让人莫名感动。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小说中历史创伤的强行植入实则为青春的呢喃，颓废与绝望的情绪提供了确切的指向，那些极端的念想、挣扎与喟叹，再也不是毫无来由的少女忧伤。

与张悦然的《茧》相似的是，在近年来的“80后”写作中，年轻的作者都曾表现出历史叙述的雄心，但也只能在个人风格化的写作中生硬地触及。比如，郑小驴的小说有一个极为鲜明的主题，那便是计划生育，作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生长的一代人，历史的缺席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刻骨的焦虑。相对于他们的前辈，那些与历史一同走过的“50后”、“60后”，甚至是社会经验更为丰富的“70后”作家而言，80后历史感的匮乏成了他们共同的特性。因此于他们而言，计划生育这个还算得上意义重大的事件，几乎构成了他们切入历史的唯一方式。青年作家陈崇正便有不少作品关切此类主题，但郑小驴笔下的计划生育题材则更为触目。

在郑小驴的长篇小说《西洲曲》中，大量的篇幅涉及到计划生育的内容。这无疑是一个敏感而又切近的主题。然而就《西洲曲》而言，可以看出郑小驴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解，还存在着一些孩子般的天真。小说的叙述固然流畅精彩，但对于计划生育具体执行者脸谱化描写的痕迹依旧明显。当然，为了彰显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而在计划生育的话题上大做文章，进而将这种悲情叙述作为作者“缺乏经验的世界”的“救命稻草”，这本无可厚非。但小说可贵的地方在于，尽管它将大量的篇幅落实在关于计划生育所展开的制度罪恶与人性悲歌之上，但它依然在批判与控诉之外，展现出一位少年难得的诚挚记忆。细读之余或可发现，这其实也是一部关于成长的故事，少年时代内心世界的诚挚袒露，那些温暖和绝望、令人感怀的青春时代、屈辱的记忆和成长的隐痛，间或夹杂着一些青春期骚动不安的情绪。因此如果说，计划生育的种种事件，弥补了个人经验的单薄无力，那么也恰是个人情感的诚挚流露，冲淡了小说对现实态度略显稚嫩的悲情与愤怒。也正是在二者之间，小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张力，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凄楚回忆中呈现出一种略带鬼气的神秘美感。

在其他作家笔下，历史也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被触及，但却见其丰满翔实的风貌。如果说笛安的《南方有令秧》将历史表述为不折不扣的传奇，在类似于“穿越”的通俗演绎中以想象做母本，写作一部“历史”，那么周嘉宁的《密林中》则试图以自己写进小说的姿态，呈现个体化时代的精神史的衰变。相较于双雪涛《聋哑时代》中历史的淡漠，以更接近青春文学的方式讲述故事，追忆成长的踏青，林森的近作《关关雎鸠》则顽强地瞩目于一种难得的“地方性”。在林森笔下，海南小镇20多年来不断衰败的历史，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记忆被清晰地讲述。在此，神灵不在，黄赌毒的横行，构成了商品经济大潮中的基本现实。小说中，社会史与风俗史的整体性，虽然只是呈现为一种简单的道德化价值评判，而历史的具体性也只是通过标志性的现实景观的流转所简单锁定，但作者的全情投入，以及由此而来的成长的诗意，还是让小说如此动人。

一个青年，只身或结伴离开故乡，他或从乡村或从小镇来到大城市，在灯红酒绿与熙攘热闹中，踌躇满志又愁云惨淡，跃跃欲试又忐忑无措，逃离故乡时头也不回的决绝，转身时却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进城青年的个人奋斗，都市异乡人的惶惑与孤独——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故事里的经典一刻和惊鸿一瞥，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几代作家都曾描述过这样的人物、情境与命运。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乡土转型、人员迁徙流动、社会结构大调整等时代现实的必然文学反映。

近几年读当下文学期刊上的中短篇小说，会发现这样的人物与故事再次反复出现在“70后”、“80后”年轻一代作家的笔下，徐则臣的《京漂系列》、甫跃辉的《顾零洲在上海》、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马小淘的《章某某》等等。这些作家作品近来都曾在中国台湾引进和出版。在这些作品中，反复呈现着一种失败的青年人生。徐则臣关于“漂在北京”的系列小说里，人物来到北京和离开北京，在对这座现代大都市的爱恨交加中不断地反证和确认自己和故乡，寻找自己的人生和生活，他们苦着痛着，熬着挨着，蚊子群租着，似乎随时准备愤愤地回乡；一面又眷念着、幻想着、期冀着，久久不肯离去，但大部分人最后还是带着受伤的身心和陨落的梦想逃离北京。在马小淘的《章某某》中，一个从三线小城春风得意地走进中央广播学院的女孩，带着爆棚的优越感与自信心，通往梦想的过程当中，她在大城市里感觉良好的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在周围人眼中却不过是屡屡上演的不合时宜甚至荒腔走板。最终，“庞大的理想终于撑破了命运的胶囊”。而在石一枫近年来广受好评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中，农村女孩陈金芳，怀揣“活出个人样”的向往转学到城里里，年少时的寒酸和脱胎换骨后的优雅，直到一场冒险的投资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失败后被彻底打回原形。

如此这般的故事情节和内容提要，大概会让人倍感熟悉、似曾相识。这是一个个“全球化时代的失败青年赋形”，又是一曲曲“青年失败者之歌”。这些人物和故事的背后，站立或匍匐着一连串的文学人物，古今中外种种沉沦和伤逝的局外人、零余人自不必说，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文学期刊上此类小说也比比皆是。他们是繁华热闹的局外人、都市霓虹灯下的背光区。侯孝贤《风柜来的人》中，一群高中毕业的男孩子从宁静的渔港风柜，怀揣着忐忑的心结伴来到高雄。在大都市的五光十色里彷徨、迷途，青春似乎无疾而终。离乡的青年在都市丛林中历经的幻灭大抵如此。海峡两岸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必然会经历这个历史阶段，而相关的文艺作品正是这个历史阶段的必然反映。

近来，不断看到有批评家就此发问：

为什么年轻一代写作者如此迷恋失败者

的故事？其实这不难理解。人们都有将自己的经验和处境夸张放大的心理倾向，在对自我的高度关注中，不自觉地夸大地夸自己所属族群、性别、代际等等的独特性。杨庆祥在《“80后”，怎么办》中，开篇所着力表达与论证的就是“80后”一代人“失败的实感”。在他看来，个体充满沮丧感的现实境遇与精神生活恰也是一代人的预定的失败。有意思的是，在和身边长辈们聊天时，长辈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可赶上好时候了；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同龄人却往往都在喟叹：咱们这代人最倒霉。那么，到底真相是什么？被上山下乡、被低工资、被下岗、被蚊虫、被高房价、被北漂一代，究竟哪个人生更失败？这其实真的没有可比性，也没法分辨清楚。具体到“70后”、“80后”写作中的“失败者”形象扎堆，我只能说，越是繁盛喧嚣的时代大背景下，个体的自我逼仄和失败感往往更加强烈。时代表面上的盛大、繁华，看起来遍地黄金和机会，其实其内部结构的千疮百孔、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已经严重阻碍了知识改变命运、个人奋斗等等传统的青年上升通道。当然，反复强调自己有多不容易，这本身大概多少也

是一种面向时代和社会的推诿和撒娇。在“70后”、“80后”青年作家笔下，自己这代人是失败的一代。这些作品各自有其风格特点和关注焦点，但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事实：失败似乎是注定的，无论个体怎么奋斗和挣扎，社会的选择机制和现实环境终将把你打回原形。陈金芳改名陈子倩，她的种种可笑可怜可悲可叹，无非也就是要“活出个人样”，就算曾经有过表面上的风光、貌似在城市里扎根，但最后还是要惨败地回农村老家。回老家，回乡，往往成为这类小说的结尾方式，因为无路可走，所以只能从哪回来哪去。这是一代人对自我的集体想象与定位吗？如此扎堆地以“失败”作为关键词来表述青春与自我，与“70后”、“80后”的成长环境与思想背景大概也密切相关。全球化、互联网+、社会转型这些时代特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人的成长和价值观的形成。看前輩作家们的小说，作品中青年人的失败感和大的时代背景密切相连，忧国忧民基调下的理想幻灭是那一代人失败感的主要来源。而在“70后”、“80后”作家这里，失败感来自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就感与存在感的缺失。当下青年人眼中的失败，同前輩人为历史家国烦忧、奋斗和幻灭的失败相比，更多是诸如出入头地、衣锦还乡之类纯粹个人主义的理想破灭。青年写作中看似花样百出、曲折波澜的奋斗故事，实际上却是格局局促而单一的。

失败者叙述中包含着一代人对当下中国社会青春文化、青年处境的精准观察与表达。但他们也必须警惕，无意识地相互重复失败感和灰色的青春文化所造成的一种不良后果。

青年失败者  
——当下中国叙事的一  
种叙事  
□ 金赫楠

——

失败者叙述中包含着一代人对当下中国社会青春文化、青年处境的精准观察与表达。但他们也必须警惕，无意识地相互重复失败感和灰色的青春文化所造成的一种不良后果。

是一种面向时代和社会的推诿和撒娇。在“70后”、“80后”青年作家笔下，自己这代人是失败的一代。这些作品各自有其风格特点和关注焦点，但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事实：失败似乎是注定的，无论个体怎么奋斗和挣扎，社会的选择机制和现实环境终将把你打回原形。陈金芳改名陈子倩，她的种种可笑可怜可悲可叹，无非也就是要“活出个人样”，就算曾经有过表面上的风光、貌似在城市里扎根，但最后还是要惨败地回农村老家。回老家，回乡，往往成为这类小说的结尾方式，因为无路可走，所以只能从哪回来哪去。这是一代人对自我的集体想象与定位吗？如此扎堆地以“失败”作为关键词来表述青春与自我，与“70后”、“80后”的成长环境与思想背景大概也密切相关。全球化、互联网+、社会转型这些时代特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人的成长和价值观的形成。看前輩作家们的小说，作品中青年人的失败感和大的时代背景密切相连，忧国忧民基调下的理想幻灭是那一代人失败感的主要来源。而在“70后”、“80后”作家这里，失败感来自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就感与存在感的缺失。当下青年人眼中的失败，同前輩人为历史家国烦忧、奋斗和幻灭的失败相比，更多是诸如出入头地、衣锦还乡之类纯粹个人主义的理想破灭。青年写作中看似花样百出、曲折波澜的奋斗故事，实际上却是格局局促而单一的。

失败者叙述中包含着一代人对当下中国社会青春文化、青年处境的精准观察与表达。但他们也必须警惕，无意识地相互重复失败感和灰色的青春文化所造成的一种不良后果。